

天津妇女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从1919年至1926年,在天津这片革命热土上,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女权请愿团、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天津女星社等进步妇女团体相继出现。邓颖超是天津早期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为天津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她自己也在运动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卓越的革命者。在2024年2月邓颖超120周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展现邓颖超的那段“觉醒年代”,以缅怀这位伟大的女性。



邓颖超的“觉醒年代”

○ 盖金香(天津)

少年励志、发愤图强

1904年2月,邓颖超出生于广西南宁,祖籍是河南光山。她出生时正值清末,国家内忧外患,更兼父亲早逝,家境十分贫苦,苦命的母女俩只好凭借母亲杨振德祖传的一点中医医术给人看病谋生。

1910年,6岁的邓颖超跟随母亲辗转来到天津。天津是全国一线大城市,工商业发达,社会风气进步,又是新思想和新式教育的发源地,母女俩希望在这里能寻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初到天津,母女俩暂住在长芦育婴堂。育婴堂是当地的一家慈善机构,杨振德凭借一技之长,得以短期内在此担任医生。堂方为母女俩提供了食宿,并给予一定的零用钱。

长期跟随母亲颠沛流离,使邓颖超历练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担当。在育婴堂,她自觉承担起了生活的重任,学习编织和绣花等技艺,自食其力获得报酬。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对她日后的人生道路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3年初,邓颖超跟随母亲离开天津,前往北京,进入北京平民义务学校三年级就读。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陈翼龙先生思想开明,经常向师生们宣传爱国进步思想,这对年少的邓

颖超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1913年夏天,邓颖超又随母亲回到天津,进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就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支付学费,1915年夏,邓颖超虚报两岁、连跳两级,考入当时免费的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6年,学校改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直隶女师),同年夏,凭着勤奋刻苦的学习,邓颖超以优异成绩顺利升入本科。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即使是男子教育也尚未得到普及,而邓颖超就读的直隶女师却能引领反封建的风气,给女子提供新式教育。不仅如此,直隶女师还具有浓厚的革命氛围: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直隶女师便成为革命精英的汇聚之地,以地理教员白雅雨、张相文等为首的同盟会会员,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在天津创建共和会,并策划参与滦州起义,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在直隶女师读书期间,邓颖超耳濡目染,深受新思想的影响。她热衷于参与学生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也非常关注。从1916年邓颖超所作《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近代民主革命家蔡锷的逝世,邓颖超深感痛惜,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在五四运动中锻炼成长

1919年5月,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广大爱国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北洋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天津是首先起来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1919年5



邓颖超(左二)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时与同学合影

月至6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罢市,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五四运动爆发时,邓颖超正在直隶女师三年级就读,当时只有15岁的她也迅速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四”洪流。由于男女不同校,当时邓颖超所在女校的学生及其代表并未被纳入天津学联。于是,邓颖超等人于1919年5月25日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员以女学生为主,还有职业妇女。成立大会召开时,有600多人到会,邓颖超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并被选为该会的评议委员兼演讲队队长。

此后,演讲队郭隆真和邓颖超两位队长带领队员组成多个小分队,深入天津各个角落,走进百姓家庭,宣传爱国思想,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邓颖超等用锋利的言辞,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北洋军阀的卖国勾当,听者无不受到感召,纷纷表示愿意协

力齐心救国。一个人力车夫在听了宣传后,立即把他当天挣的3角钱捐献给了演讲队;而另一名妇女则用典当衣服的钱印制了题为《一得之愚》的传单,追随演讲队员一起来呼吁救国。

此外,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还以文艺为载体,开展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活动。邓颖超参与编写并主演了新剧《花木兰》和《安重根》,两部剧在广东会馆进行了多次演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随着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及封建思想的逐渐破除,1919年9月16日,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在内的20名学生打破男女界限,创建了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觉悟社的成立标志着天津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获邀来到天津讲演,给予觉悟社成员很多具体的指导。邓颖超作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为代表,向李大钊介绍了该社成立的经过和旨趣,并表示要向北京前辈学习。

1919年10月10日,天津的觉悟社、新生社两家进步团体组织领导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集会,大会发表了“双十宣言”,与会群众手持印有“推翻恶政府”“誓杀卖国贼”等字样的旗帜,痛斥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政府假“共和”之名镇压爱国群众的罪行。邓颖超是这次大会的14名主席团成员之一。

为了冲破军警的封锁,使游行示威能够成功进行,邓颖超、李锡锦、吴瑞燕等多名手无寸铁的女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她们不顾警察的阻拦和殴打,带领同学们首先冲出包围圈。上海《申报》对天津的双十节游行示威进行了报道:“杨以德派军警禁阻共和纪念庆祝游行,并击伤男女学生。邓文淑(邓颖超)被伤吐血。”闻见者无不动容。

在天津双十节斗争的带动下,

各地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给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11月7日,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了于1919年10月1日在新华门前逮捕的各地请愿代表。在这场斗争中,邓颖超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形象,给天津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1月20日,觉悟社创办的刊物《觉悟》出版发行,邓颖超以“壹”署名撰写文章发表在《觉悟》第一期上,提倡谦虚态度、民主作风和力行好学的精神。

1920年4月6日,天津《益世报》惊爆这样一则消息:“昨日(5日)下午4时,天津学生代表24人……在警察厅门前聚齐,要求将被拘代表24人换出,情愿代为执行。”这条消息顿时在津门引起轰动。

原来,自1919年11月福州发生日本暴徒打伤、枪杀中国学生和巡警的惨案后,全国爱国反日情绪高涨。1920年1月29日,天津学生在反对日货的爱国活动中,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酿成“一·二九”

惨案,50余人受伤,周恩来等一批爱国师生被捕入狱。“一·二九”惨案发生后,天津全市学生罢课抗议。学联分派代表赴北京、上海等地呼吁支援,掀起了全国性的支援天津学生的大游行、大示威。

如何营救被捕的学生?经过深思熟虑,同学们想出了一个办法。1920年4月5日,邓颖超等24名学生共同签名,备了公文、带了行李,前往警察厅要求代替被捕师生入狱,迫使警察厅长出面与他们会谈。邓颖超在与警察厅长的交涉中,始终保持严谨、稳重、理性的态度,坚持自己的立场。经过多番交锋,警察厅最终同意让同学们前往警察厅的后花园,与被捕的代表会面,并参观他们的住所。此次营救活动大大支持了周恩来、于方舟等进行的狱内绝食斗争,并加速了警方释放被捕代表的进程。7月,法庭被迫宣布将周恩来等20多名被捕代表无罪释放。

1920年8月16日,已经从直隶女师毕业的邓颖超参加了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等起草的《改造联合宣言》,明确提出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实行社会改造,强调要“到民间去”,“切切实实做点事”。邓颖超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并与大家就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年轻的邓颖超走上街头慷慨激昂搞宣传,游行示威时冲锋在前,又能机智无畏地与反动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她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快速成长为天津爱国反帝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人。

领导天津妇女运动走向深入

1921年,天津的民族资本家乐达仁出资创办了国民女子学校——达仁女校。感佩于邓颖超的老师马千里在五四运动中所展现出的爱国精神,乐达仁亲往新民意报社,诚挚邀请马千里出任达仁女校的校长,后又接受马千里的建议,聘请邓颖超、李峙山、周之濂等觉悟社成员执教达仁女校。1922年夏,邓颖超来到达仁女校报到。在这里,她保持一贯积极进步的作风,任教之余大力从事进步活动,一边向学生传授学科知识,一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旧国会,提倡制宪。全国女界借此机会发起参政请愿运动,要求在宪法中规定男女平等权利。天津的一些妇女团体也发起女子参政请愿团,但效果不佳。邓颖超等认识到,参加爱国斗争,女子光争取参政解决不了问题,还必须把女子权利问题解决。为此,邓颖超等发起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

1922年11月6日,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成立大会在直隶女师礼堂举行,标志着女性在争取法律上的主权利益地位方面迈出坚实一步。邓颖超在会上的演讲振聋发聩,呼吁姊妹们团结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之后,邓颖超等代表向国会递交了有7条诉求的请愿书,但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女权方面的诉求也未被宪法采纳。这一经历使邓颖超等女权同盟会成员深刻认识到,政权不在自己手中,所有关乎妇女切身利益的问题,都将面临无望的困境。“我们必须和革命民主

派共同努力,首先从封建军阀手中夺回政权,将其掌握在平民手中。”

1923年3月24日,邓颖超的直隶女师同学、觉悟社成员张嗣婧因受封建婚姻制度的迫害而离世,这一悲剧使邓颖超更加认识到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她发表多篇文章,强烈呼吁女权同盟会成员行动起来,援助受压迫的妇女,并坚决鼓励女性摆脱旧礼教的束缚。在当时,邓颖超特别强调婚姻自由是妇女实现独立的基础,而恋爱自由则是必要的前提,她认为错误的恋爱关系是非常危险的。

1923年4月,一个更为严谨的妇女组织女星社诞生了。女星社成员人数不多,其组织结构却相当严密,新成员需要经过两名成员的推荐,经过全体社员的表决通过,才能够正式入社。该社对于新成员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不分男

女,都必须具备对妇女运动的热情,志趣须与社团相符,并且能够遵守社规。女星社的成立旨在打破天津社会的沉闷氛围,推动群众进步运动的蓬勃发展。1923年4月25日,女星社创办了《女星》旬刊,用以宣传女子自救自决的思想,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

女星社的成立体现了邓颖超对于妇女权益的关注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考虑到在封建枷锁禁锢下的旧中国,要让中国妇女真正地挺起胸膛,首先需要在她们的思想中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于是,女星社决定在天津创办一所补习学校,为妇女们传授知识和技能,以此作为唤醒妇女意识、培养她们自主能力的起点。为了筹集办校的经费,邓颖超等人经常进行募捐义演。她性格豪爽,在剧中女扮男装,扮演一名新闻记者,其表



邓颖超在话剧《新闻记》中饰演男记者

演细腻生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23年8月25日,邓颖超等人创立的女星第一补习学校正式开学,邓颖超担任教务长,并亲自为学生授课,她以身作则,激发了妇女们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自主的勇气。

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邓颖超认识到了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并亲自领导了天津的妇女运动,邓颖超也因此在天津教育界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不仅如此,她还曾先后担任直隶省教育会委员和天津市教育会执行委员,充分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影响力。这些都为她进一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成为天津党团工作的骨干

1924年1月,邓颖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3月,她在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作为团地委第一位女候补委员,邓颖超与团地委委员长于方舟密切配合,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在团员教育方面,天津团地委将《团刊》《向导》和《中国青年》定为每个团员必读的刊物,同时,《社会主义讨论集》《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和《共产党宣言》也被列为团员初步必读书籍,这大大提高了团员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更好地投身革命实践。

在宣传工作方面,天津团地委要求团员参与平民教育运动,向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暑假返乡时要到农民中去,调查并宣传农民生活状

况,开办平民学校。他们还深入工厂,调查工人生产生活状况。

在邓颖超和于方舟的共同努力下,天津团组织迅速健全,截至1924年6月30日,天津团员已发展至65人。

妇女工作仍然是邓颖超关注的重点。1924年1月1日,《妇女日报》创刊,在邓颖超、刘清扬等人的努力下,该报专注于报道与妇女权益相关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这些文章宣传了先进思想,深入探讨了实现妇女权益的具体道路。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妇女日报》的引领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她们的权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妇女运动的先驱、早期中共党员向警予给予《妇女日报》高度评价,称其为“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

1924年11月初,为了能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早日实现共和,孙中山决定动身北上。

邓颖超为支持孙中山北上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2月,邓颖超发起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呼吁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实现。

1925年3月,邓颖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颖超听从党组织的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被委派为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入党之后,立刻与于方舟等共同策划组织了天津有史以来第一次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时任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任书记于方舟赞誉邓颖超等女同志:“诸君都是些妇女运动的先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病不幸逝世。邓颖超和全国人民一样陷入极度悲痛中,她代表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北

京参加追悼活动,并参加守灵。

孙中山的逝世、国民会议的流产,使时局重新变得消沉。但邓颖超没有灰心,她决心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继续广泛宣传和组织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推动天津妇女运动深入发展。不久,党组织安排她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兼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当时,在全国各地和中共中央还没有成立妇女部,天津成为响应中共四大、最早成立妇女工作组织机构的地方。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消息迅速传到天津,邓颖超带领天津各界妇女立刻投入声援上海工人的伟大斗争。在新成立的天津各界联合会中,她当选为主席团五位主席之一。

邓颖超的爱国行动和号召力,引起了天津当局的注意,她的处境非常危险。1925年7月13日,根据党的指示,邓颖超南下前往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去迎接更大的挑战。

天津时期是邓颖超成长的一个重要时期,可以说,正是在天津,孕育了邓颖超的革命精神,她也在此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战士。因此,邓颖超对天津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1992年,邓颖超逝世,她的骨灰被盛放在曾经盛过周恩来的骨灰盒中,全部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这除了因为天津是周恩来、邓颖超相遇的地方,是他们革命开始的地方外,可能也包含着邓颖超对自己那段“觉醒年代”的怀念吧。(题图为青年邓颖超)

(责任编辑:徐嘉)